

# 资本时间治理术的审思\*

——基于马克思的时间正义理论

□ 王甄玺

**内容提要**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时间治理术不断重塑劳动者的时间状态并呈现出劳动时间资本化、自由时间疏离化和闲暇时间消费娱乐化。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时间治理术对劳动者的规训是将劳动者支配到机器旁不断进行剩余价值生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时间治理术演化出全新治理技艺，通过数字监管和数据指标精密地划分和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兼具控制和规训功能的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是资本时间治理术的外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方位拓展是资本时间治理术的内核。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时间正义的实现与资本时间治理术的扬弃是同一过程，要实现时间治理术的变革，既需要着眼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祛魅，也要超越抽象的时间分配正义以及时间享有走向数字社会主义。

**关键词** 时间治理术 消费 娱乐 时间正义

作者王甄玺，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大城市学院基地研究员。（杭州 310015）

DOI:10.14167/j.zjss.2025.08.001

近年来社会热议的焦点几乎都与时间紧密相连，从固定时间表到弹性化、灵活化的全面重构，现代工作时间的变革已渗透至每个角落，紧张的社会步伐与快节奏生活充斥于每个人的生活。西方理论家、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时间加速展开分析，大卫·哈维从时空压缩角度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摧毁了传统社会的时间生态，“时间范围缩短……我们必须学会处理由空间和时间的‘压缩’所带来的一种势不可挡的感受”。（David Harvey, 1990, p.240）哈特穆特·罗萨认为现代社会时间结构处于紊乱且加速的状态，并分别从技术加速、社会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三个方面分析时间异化，指出社会节奏变迁加速不仅没有实现解放，反而成为一种奴役。（哈特穆特·罗萨，2018，第110页）斯蒂格勒从科技角度分析时间节奏的议题，认为科技作为一种“新世界观”正通过时间对人类进行控制。（贝尔纳·斯蒂格勒，2012，第31—32页）我国学者分别从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本论》的现代西方文明批判及其现代化启示”（项目编号：2025NDJC151YB）的阶段性成果。

“数字资本主义”“科技加速”“现代性”为主题来分析时间加速。<sup>①</sup>总的来看，国内外学者较少将“时间加速”与“治理术”关联起来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因此为本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时间治理术留下了研究空间。

治理术作为生命政治学的重要概念，聚焦的是权力形式与主体塑造之间的关系，即“权力-主体”由“治理术”相联结。（张凯，2020，第42页）资本时间治理术亦如此，是资本权力“按照自己的面貌”对“时间-主体”的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空节奏的加速与其说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所带来的历史进步，毋宁说是资本权力主导下资本时间治理术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探究资本时间治理术的运行与主体间的真实关系，需要“回到马克思”。马克思所理解的时间治理术并非作为超越权威的政治权力，而是深入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普照的光”和“特殊以太”并具备“支配一切”的资本及其依附的生产关系。

## 一、资本时间治理术下的时间样态

从莎士比亚到卢梭，从马克思到马里涅提，许多作家和思想家自始至终都关注着时间节奏的加速。在马克思这里，时间节奏的加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关。马克思在《资本论》1卷第8章《工作日》中对劳动时间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这一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密码”，更在深层次的逻辑中剖析了“资本时间治理术”。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资本时间治理术”的概念，但在对资本权力内核的图绘中已经涵盖了关于资本时间治理术的分析。在资本时间治理术中，时间节奏呈现了三种状态：劳动时间资本化、自由时间疏离化、闲暇时间消费娱乐化。

### （一）劳动时间资本化

劳动力成为商品既是马克思开启《资本论》的起点，也是资本时间治理术萌生的开端。严格的生产时间表、周密的劳动时间监控机制、精细化的分工流程使劳动者的时间牢牢地黏合在资本运行的轨道中。这里的劳动时间与马克思阐释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同，前者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雇佣劳动时间，后者是工人为再生产自身劳动力价值所必须付出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资本化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消解了白天与黑夜的时间边界，也表现在人体生理限制的突破。24小时轮班制将昼夜交替的自然节律解构为资本增殖的计量单位，劳动者被迫与机器的节奏同步，其生物钟不断被重新编码。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使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越过这个极限……习俗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20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了劳动时间资本化的“景观”：成年劳动者因高强度的时间剥削不断突破身体极限而普遍呈现出“未老先衰，寿命不长，迟钝而又贫血”的特征，儿童则普遍“身材矮小，发育不良”，（同上，第284页）即使是13岁以下的儿童，其工作时间也“长达12~16小时”。（同上，第287页）马克思十分清楚，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节约了劳动时间，但并未缩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物化为商品，工人之间没有“质”的区别，仅存在“量”的差异，并根据劳动时间的

<sup>①</sup>肖峰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对用户时间的争夺已从固定工作时间转向至碎片化的时间，加速的感受源于数字资本主义本身。参见肖峰：《数字技术资本化与劳动新异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孙亮认为，算法作为资本发展的方向，其迭代加速深刻影响着人类对时间的感知，参见孙亮：《“算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阐释》，《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蓝江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是“时间加速的赌局”，参见蓝江：《空间、时间与生命政治：价值形式的三次重组——〈资本论〉来解读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价值形式》，《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2期。

长短分为“全日工”和“半日工”。(同上, 281页)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生理休息时间与社会劳动时间之间的张力不断扩大,并非劳动力的生理状态决定劳动时间,相反,劳动力最大的耗能量决定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同上, 206页)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意识到了劳动时间资本化的样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性的性质……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卢卡奇, 1999, 第154—155页)劳动时间作为劳动力商品的表现形式,在生产链条中赋予了商品的性质,尽可能多地占有劳动者时间就意味着更大程度地实现剩余价值生产。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时间治理术的治理技艺不断迭代,不仅具有控制功能,也兼具规训的功能。劳动时间资本化不再是将劳动者固化在流水线中,而是通过精密的数字算法与技术管理,要求劳动者不断完成各项绩效指标,绩效的增长成为衡量劳动者创造价值的标准。“时间=金钱”作为劳动时间资本化的内在逻辑,其宣传的意识形态试图告诉劳动者要想获得更多收入和更好的生活,就必须尽可能多地压缩自身的休息时间,将自身全部时间“奉献”给工作。在劳动时间资本化的进程中,时间的功能与性质发生扭曲,劳动时间由人类活动的应变量变成抽象化的自变量,成为“一昼夜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05页)劳动者作为可增殖的商品只能在工作与睡眠的模糊边界中苟延残喘,为了维持自身的雇佣状态、避免成为“剩余人口”,劳动者只能被迫地将生活的全部领域“祭祀”给资本。即使是非物质生产性的劳动者也必须长期承受高压的劳动状态,以脑力和体力双重的消耗为资本提供增殖。

## (二) 自由时间疏离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的不断变革……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使时间节奏具有高度不稳定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作为人的生命尺度,是劳动者可自主支配的、摆脱物质生产束缚的时间,其赋予个体存在的方式和意义,实现合乎人性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自由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70页)但是,在资本增殖的轨道中,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和主体呈现的是疏离化,原因无他,资本时间治理术致力于使自由时间成为资本循环的新场域,使个体与其自由时间的关系从“自我占有”滑向“自我剥削”。

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时代,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直接性和强迫性占有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而当代资本时间治理术则是通过“自由选择”的治理技艺(弹性工作、零工经济、绩效指标等),占据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与主体的疏离化并非简单的“时间剥夺”,而是自由时间的内在结构与意义被系统性地扭曲。如韩炳哲所言,资本的现代剥削已从“否定性规训”转向“肯定性剥削”,即通过“你能够”的话语使劳动者形成自我压迫。(韩炳哲, 2019, 第16—17页)

时间与空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单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建立在自由时间充分实现的基础上。然而,加速的时间节奏和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使生命主体对时间的占有呈现负相关状态,自由时间日益成为稀缺品。

罗萨指出:“19世纪以来人类的睡眠时间平均降低2小时,而1970年以后睡眠时间再次减少了30分钟。”(罗萨, 2018, 第12页)无疑,科学技术的进步释放了大量的自由时间,使现代社会劳动者告别了“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并获得了看似自由的时间,但这种自由时间是虚假的。利波维茨基指出,数字化、信息化的劳动形态已消解了工作的空间与时间限制,并占据了生活的全部领域。(吉尔·利波维茨基, 2005, 第69页)数字化生产、赛博空间、自媒体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没有降低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和时间的长度,甚至将工作的空间和工作的内容延伸至卧

室、厕所、地铁、咖啡厅等生活领域，24小时全天候和全区域覆盖的互联网使劳动者随时“听候指令”，若拒绝加速的工作节奏与资本时间治理术的规训，则工作产业链上大量的“产业退役军”（相对剩余人口）成为“随时可上阵”的劳动力后备军。政治经济学家曾盛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技术革新与组织模式升级对人类生产效率带来颠覆性提升，大量的剩余时间可以服务于人类自由的实现。然而，在资本时间治理术中，效率革命带来的“剩余时间”必须服务于生产剩余价值的劳作机制，并未如理论预期般转化为劳动者自我发展的条件。劳动者或是在仅有的休息时间内被数字化生产工具缠绕，或是将仅存的自由时间投入到消费和娱乐中。在资本与科技深度耦合的当代语境中，劳动者陷入“时间贫困”与“物质贫困”的悖论性困境。

### （三）闲暇时间消费娱乐化

闲暇时间与马克思阐释的“剩余劳动时间”不同，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剩余劳动时间”是指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且被资本无偿占有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72页）闲暇时间作为马克思时间理论的重要概念，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时间之外的可支配时间。资本时间治理术对主体闲暇时间的重塑历经三个阶段：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阶段，生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核心，资本时间治理术要求更少时间、更低成本、更高效地加速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广大劳动者几乎无法享有闲暇时间。因此，无限制地占有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成为资本时间治理术的主题；消费资本主义阶段，消费取代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运转的中轴，资本时间治理术则释放出大量的闲暇时间，借助广告、媒体引导劳动者加速消费和娱乐，消费与娱乐被编织为生命存在的意义，人的闲暇时间呈现出消费娱乐化；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主体的闲暇时间、注意力和数据成为稀缺资源，资本时间治理术不再是将肉体支配到机器旁而是转变为闲暇时间和注意力的控制，海量的娱乐信息、购物信息创造无数的视听景观，诱导着主体不断地牺牲闲暇时间，从新闻爆料到网络炒作，从电子链接到资讯报道，从平台推送到算法过滤，在“信息茧房”里，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在周密的算法计量中时刻被占据，闲暇时间异化为消费主义的容器。

以《魔兽世界》为例，魔兽世界玩家平均需要“牺牲”500个小时才能完成游戏的基本要求。麦格尼格尔指出，自2004年《魔兽世界》席卷全球以来，网络用户玩家在该网络游戏所付出的时间至少500亿个小时（593万年），相当于人类物种的演化时间。（简·麦格尼格尔，2016，第56页）资本时间治理术不再是将人的闲暇时间作为生产资料加以控制，而是将人的闲暇时间作为消费娱乐的空间加以规训。在罗萨看来，当下人类社会时间的流动与利用是建立在“刚性的、寒冷的和冷漠的”闪烁屏幕中。在此，时间成为“可供消费与娱乐的虚假时间”。（Rosa Hartmut，2019，p.32）无疑，闲暇时间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是资本为了加速增殖而打造出来的，消费和娱乐本身在于不断占有主体的闲暇时间。在这一过程中，闲暇时间具有了新的性质：“闲暇时间消费化”和“闲暇时间娱乐化”。闲暇时间的存在是为了消费和娱乐买单，因为，占有人的闲暇时间就意味着生命可有效地服从资本。事实上，资本时间治理术将闲暇时间本身视为商品并不断将闲暇时间加速地割裂为“碎片时间”，使各个“碎片时间”更好地为资本逐利所服务。在资本时间治理术的精密操控下，人的情感需求、闲暇时间与资本增殖深度绑定，平台通过用户偏好分析推送精准广告，形成“欲望生产—即时满足—新欲望制造”的永动机。如马克思所言，工人阶级本身及其消费“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1页）

## 二、资本时间治理术的外壳与内核

资本在时间与空间的多重裂变中持续性向外延伸，从而将资本时间治理术的触角蔓延至各个领域。科技的飞跃释放了大量的剩余时间，但社会节奏呈现的频率不低反高。然而，时间无法具有实质意义的加速，当代社会的劳动者却常感缺乏时间。无疑，现代社会的资本时间治理术与工业革命时代有所不同，时间盘剥的样态悄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资本主义时间治理术有了新的外壳——娱乐主义与消费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作为资本时间治理术的外壳极力展示时间的丰富性与自由性，并试图通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使资本逻辑隐匿其中。事实上，剩余价值的加速榨取需要无酬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共同剥夺，资本时间治理术的内核指向的是资本从“工厂”到“生活”的全方位拓展。

### （一）资本时间治理术的外壳：消费主义与娱乐主义的“联姻”

“获取注意力”“制造诱惑”“唤醒欲望”既是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剥夺劳动者时间的重要特征，也是二者作为资本时间治理术外壳的依据。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对时间的吞噬不能单向地指向思想场域，而必须深入物质生产中。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产物与时间加速有密切关系。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强劳动强度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手段。面对社会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调整时间治理术并使劳动者获取相对的闲暇时间。马克思敏锐地发现这一变化并指出，“资本……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增加了劳动者的剩余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9页）这看似违背了资本的意志，但事实上是资本时间治理术变得更加隐蔽并找到更巧妙的方法实现剩余价值的创造——娱乐与消费。福柯指出，现代社会的“乐趣、快乐、休息”正在转换为“连续的生产力，持续地提供给市场”，（米歇尔·福柯，2018，第205页）区别于早期资本主义阶段仅依靠对劳动时间的剥夺来产生剩余价值，“进阶版”的资本时间治理术将劳动者塑造为“消费人”和“娱乐人”，即时、零散和无序时间嵌入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被用于消费和娱乐，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以感官愉悦和身份建构为诱饵，被资本包装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使劳动者的时间顺理成章地成为资本的“角斗场”，并深深地嵌入日常生活的场域中，如克拉里所言，消费和娱乐是资本时刻捕捉劳动者眼球的手段，“随意点开一个网页……通通都被每分每秒地分析和量化”。（乔纳森·克拉里，2015，第55页）

“技术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任保平、郭晗，2024）但在资本时间治理术的驯化中，技术的不确定性被约束和定向。在此，娱乐不再提供完整信息叙事，而是成为刺激神经回路的“电子尼古丁”。瓦纳格姆认为消费与娱乐的“意识形态景观”是现代资产阶级编制的谎言，在这一谎言中，资本时间治理术可以对劳动者的时间进行全方位的掌控，将劳动者固化在丧失超越性的消费与娱乐“围城”中，成为“甜蜜苟活而无用的阶级”。（鲁尔·瓦纳格姆，2008，第48页）各种数字平台的信息试图不断剥夺劳动者的“注意力”“个人偏好数据”“社交选择”，将消费和娱乐的“景观”以数字化终端的形式（智能手机）充斥于劳动者的眼帘。娱乐与消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重要环节，是刺激生产和完成资本循环的主要方式。（鲁明川，2022）在娱乐和消费的数字化景观中，闲暇时间不仅没有成为主体自由发展的条件，反而成为资本时间治理术通过消费和娱乐使资本增殖的契机。在这一过程中，符号消费已代替物理消费，快节奏的社会生产使商品在尚未结束使用寿命之前就已变得落伍。（包大为，2022）消费主义与娱乐主义作为资本时间治理术的外壳，

不断击溃劳动者注意力的防线并试图将“时间去哪了?”的问题归于劳动者自身的消费与娱乐。在消费主义与娱乐主义这一资本时间治理术外壳中,生命被拆解为娱乐与消费的各个环节,劳动者难以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审思。(赫尔嘉·诺沃特尼,2011,第1页)

### (二) 资本时间治理术的内核:资本从“工厂”到“生活”的全方位拓展

在资本时间治理术中,娱乐主义、消费主义通过数字化平台虽铸就了劳动者时间占有的空间,但是时间剥夺的土壤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事实上,资本时间治理术依然是“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委员会”的产物,对时间的剥削必须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是一个运动的范畴,一个扩张的范畴。”(莫伊舍·普殊同,2019,第312页)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阶段,资本通过工厂制度控制劳动者的时间,流水线上的福特制将劳动者肢解为一个个标准化的时间单元,工人被迫将生物节律调整为机器节奏。福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时间被精密地划分,目的是为保证“时间的积累,利润的持续增长”。(米歇尔·福柯,2019,第180页)即使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溢出了大量的剩余时间,这种剩余时间服务的主体也并非广大的劳动者,而是被资本和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所占有,无产阶级除了饮食和睡眠等必要生理时间外,其余的时间全部贡献给资本。在资本的链条中,资本家必须绞尽脑汁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突破工人的生理和道德界限早已成为常态。工人运动的抗争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使得资本不得不调整策略,最终使劳动时间的量趋于稳定。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已在时空裂变中衍生了新的剥削形式,劳动者由传统的“他者剥削”演化为绩效制的“自我剥削”,并从工作空间扩展至生活空间,资本剥削方式由显性规训演变为隐性治理。

马克思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会从头到尾地更新……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24页)如果说早期资本时间治理术对主体时间塑造呈现出的是压抑性治理技术,那么在数字时代,资本时间治理术则呈现为对生命主体日常生活的支配,是一种将主体时间重塑为全方位管理的治理技艺。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无产阶级高强度的时间剥削与数字资本主义释放出的相对闲暇时间并非矛盾,而是资本的全方位拓展结果。释放的闲暇时间不在于使人拥有自由时间发展自身,而是转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9页)诚然,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付出的时间成本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时间治理术所设计的时间结构并非单纯地服务于社会的生产生活,而是要将时间全部“奉献”给资本逻辑。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存在,资本全方位拓展的脚步就不会停下。

## 三、资本时间治理术的扬弃与时间正义的探寻

资本时间治理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具有隐蔽资本生产的特质,能够自然地、轻易地嵌入劳动者生活的全部内容。当然,资本时间治理术也暗含了劳动者与资本在时间加速中的对抗性关系,即时间的透支性消费与生命的倦怠化引发了严重的公共心理危机与社会危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找到了“反妖术”的艺术。只要时间还被资本所控制,人类主体就无法从时间治理术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对资本时间治理术的扬弃与时间正义的实践是同一过程,这指向的是祛魅资本时间治理术意识形态的叙事,超越时间分配正义以及时间享

有走向数字社会主义的政治愿景。

### （一）资本时间治理术意识形态的祛魅

资本时间治理术的意识形态叙事本质上是将时间异化为可量化、可切割、可交易的抽象物。这种意识形态叙事通过技术理性、进步神话与个体责任论等方式，将时间转化为自我实现的道德律令。若向前追溯时间与金钱的叙事，新教将“珍惜时间”与“上帝选民”身份绑定，将浪费时间等同道德罪恶感。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年鉴》中确立了“时间即金钱”命题。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剖析的“天职观”，将劳动时间圣化为“上帝选民”的身份确证机制，上述思想共同编织出“时间即自我实现”的意识形态。

人类与时间功利化的冲突并非新现象，古罗马剧作家普罗图斯曾对日晷作为计时器进行反思，它“把我们的一天分成这么讨厌的小份……它会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吃饭了……不到太阳落山我就不能吃饭，整个村子都是这讨厌的刻度盘”。（拉塞尔·福斯特、利昂·克赖茨曼，2004，第3页）在时间尚未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染指的时代，主体的日常行动参照是生物体自身。当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使钟表普及化和工作时间精准化，时间作为集体行动的参照，脱离了自然界和生物学，成为一组冰冷、独立和客观的数字。线性、连续和可计算的技术性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以确立，并在意识形态的叙事中不断强化“时间即金钱”。

资本时间治理术意识形态叙事的强化不在于身体规训或时间技术化，而是理性、机械和计算性的资本逻辑嵌入了技术和意识形态之中。在此，技术与意识形态叙事的方向是形成环环相扣、不断驱动劳动者进行剩余价值生产，更好地配合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发展至今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叙事和数字技术不断重构着人们的时间体验，人类在资本时间治理术的意识形态叙事中呈现出身心双重倦怠。面对这一难题，马克思主义者指向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叙事的祛魅，这要求粉碎“时间就是金钱”的资本主义元叙事，时间从资本增殖的燃料还原为生命意义的载体。

在数字时代的今天，无产阶级政权不仅要数字空间信息的生产进行严格的把关，更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甄别，瓦解资本时间治理术的叙事在数字场域对劳动者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的侵蚀，使时间真正地服务于劳动者本身，让每个人从“被计算的时间客体”转变为“自主定义时间意义的主体”。当技术发展意识形态从资本积累逻辑转向人类繁荣逻辑，时间才可能重归主体性建构的轨道。

### （二）时间分配正义的超越

资本时间治理术背后是资本权力结构对时间的操控。工业革命时期，工厂通过机械钟表将工人时间切割为标准化劳动单元。福柯称之为“规训权力”对生命时间的殖民，这一批判性视角触及人类自由与压迫的深层矛盾。在数字时代，资本时间治理术通过平台与算法精准地计算用户注意力留存时长，实现了更隐蔽的“时间剥削”。德波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时间本质是“伪循环时间”，这种时间常以休闲、消费和节日等形式伪装起来，不仅使日常生活变得麻木，也将自由时间与主体割裂开来。（居伊·德波，2017，第97页）

自由须在时间中实现，部分理论家将理论靶向指向了时间的分配正义，并假设个体具有平等的支配能力，这忽视了现实的经济关系差异。诚然，时间分配的正义具有现实重要性，但是，抽象地论述时间的平等与正义往往会陷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对时间正义的实现与人的全面发展毫无益处。马克思曾在批判拉萨尔时，指出劳动所得的“公平的分配”之类理念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呓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2页）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

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扬弃资本的统治，才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时间。时间正义不是在量的层面重新分配时间，而是在质的层面使时间从资本时间治理术中解放出来，劳动者可以摆脱资本的束缚和时间压迫感。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劳动者可以自主地支配和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实现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这要求将社会劳动缩短至最低限度并为每一个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7页）

当然，马克思所论述的自由时间并非闲暇时间，而是用于“个人受教育”“发展智力”“履行社会职能”“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06页）自由时间的回归不是通过闲暇可完成的，“动物式的享乐”和“拜物教式的消费”不是自由时间，甚至会以物化侵蚀人的自由时间。因为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对闲暇时间的占有不属于自由时间而是消极时间。合理的休息、娱乐和消费是为了恢复劳动者的体力以维持其生命的劳动状态，并不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发展。时间正义在于资本成为“整个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工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至最低限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9页）在此，劳动者才能真正享有自由时间并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

### （三）时间享有走向数字社会主义的政治愿景

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时间剥削并非当代特有的现象。从封建社会至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都在试图控制劳动者的时间。尤其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今天，生产生活的数字化使得时间剥削变得更加巧妙，行动主体一举一动都可以储存于数据处理器中，以剖析行动主体闲暇时间的流向。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与时间治理术不能简单地纳入上层建筑维度，而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生产性治理技艺。脱胎于资产阶级母体的技术与互联网企业往往成为资本主义时间治理术的重要力量。

曾经资本时间治理术在意识形态中宣称技术将实现真正的自由时间。但是，时至当下，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技术的发明与应用非但没有使人类在时间与空间中得以解脱，反而通过掠夺人们的数据、时间、注意力获取了高额的利润。劳动者在资本治理术中成为单一的数据和代码，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面对资本主义时间治理术的“魔法”，时间享有走向数字社会主义的政治愿景是扬弃资本时间治理术的重要道路。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7页）要实现自由时间的真正占有，必须实现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占有，“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00页）当然，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今天，要争取更多的自由时间、用较少的必要劳动时间创造更多的生产力，就必须将社会主义文明与生产力相结合，若无生产力而仅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愿景，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穷的普遍化……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在信息技术革命和人工智能浪潮的当代，数字社会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区别并非科技路线的差异，而是生产关系的根本调整。数字社会主义以人民逻辑代替资本逻辑，时间价值不再单纯以经济效益创造为标准，而是更注重时间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维度的意义。今天，中国正在创造的数字社会主义时间文明，既不是对工业社会时间纪律的简单延续，也不是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被动适应，而是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驾驭资本和技术，致力开创人类时间解放的新文明形态。这种现实实践既为马克思主义时间理论注入当代活力，也为全球数字时代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范式。

数字社会主义政治愿景通向的是人类共同利益与价值关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中国人民，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2021，第36页）

## 四、余 论

今天，人类深陷资本时间治理术构序的时间景观中，葛兰西曾以“隐形霸权”来描述资本挥舞的“魔法”使所有生命和灵魂囚禁于意识形态的迷墙中。资本时间治理术的全球性蔓延恰恰具有这种生命特质。如何使主体“消失的时间”从资本时间治理术的迷墙中摆脱出来，如何在时间节奏加速的时代构建一种新的属人性的存在，如何扬弃资本时间治理术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时间，这一系列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即使资本时间治理术业已将所有生命纳入时间加速的漩涡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时间只能被动地接受其矫正的样态。事实上，在时间加速的时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突破资本时间治理术的现实性。当无产阶级夺取时间治理的领导权，引导数字平台服务劳动者主体，在空间和时间上对生命主体的生存与发展进行新的价值审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保障中，资本只能作为一种要素参与服务人民现代化道路的建设，在此，时间正义性具有了可能性，人的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才真正摆脱资本时间治理术的迷雾。当然，要实现这种以共同生产力为根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 参考文献：

1. 包大为：《消费的对象性结构与意识形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2.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3. 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
4.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5. 赫尔嘉·诺沃特尼：《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金梦兰、张网成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 拉塞尔·福斯特、利昂·克赖茨曼：《生命的节奏》，郑磊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
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 鲁尔：《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 鲁明川：《美好生活视阈下的消费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
10. 吉尔·利波维茨基：《超级现代时间》，谢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 简·麦格尼格尔：《游戏改变世界》，闫佳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12.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4. 米歇尔·福柯：《惩罚的社会》，陈雪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15.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
16. 乔纳森·克拉里：《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许多、沈清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17. 任保平、郭晗：《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逻辑与实践路径》，《商业经济与管理》2024年第8期。
18.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19. 张凯：《生命政治：现代国家治理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版。
20.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1990.
21. Hartmut Rosa, *Resonance: A sociology of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 New York: Polity Press, 2019.

责任编辑 戴道昆

**Reflection on the Capital Time Governance Technique: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Time Justice** (27)

Wang Zhenxi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City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Abstrac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pital's temporal governance has continuously reshaped workers' temporal existence, manifesting in the capitalization of labor time, the alienation of free time, and the consumerist-entertainment orientation of leisure time. During the industrial capitalist stage, capital's temporal discipline confined workers to machinery for perpetual surplus value production. In the digital capitalist era, this temporal governance has evolved new techniques of control, utilizing digital surveillance and data metrics to meticulously partition and appropriate workers' labor time, free time, and leisure time. Entertainmentism and consumerism, functioning as dual mechanisms of control and discipline, constitute the external shell of capital's temporal governance, while the comprehensive expansion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modes forms its core. From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the realization of temporal justice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capital's temporal governance constitute a unified process. Achieving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in temporal governance requires both dispelling capitalist ideological mystifications and surpassing abstract notions of temporal distributive justice, ultimately progressing toward digital socialism through the reclamation of temporal autonomy.

**Key words:** time management technique; consumption; entertainment; time justice; Marx

**Market Construction of Data Elements Empowers Firm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ternal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Evidence** (36)

Yu Mingxuan, Wen Weirong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Based on all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3,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trading platforms in different citi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use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marketization of data elements on firm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market construction of data elements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firm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non-state-owned firms, cities with more complet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cities with more severe market segmentation. Further discussions reveal that the marketization of data elements also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r firms in neighboring cities and the same industry. Path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improving firms' disruptiv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promoting firm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e indirect ways to enhance firm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ata elements; data trading platform

**Digit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51)

Peng Yixiao<sup>1</sup>, Liu Shuyi<sup>2</sup>, Li Jianqin<sup>3</sup>

(1. *Zhejiang Development & Planning Institute, Hangzhou 310030*; 2&3.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government is a crucial national strategy that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enhancing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is study utilizes data from 281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6 to 2021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gital govern-